

构建知识生成导向的学科翻译史分期逻辑

杨涛 董明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命题。在此背景下,翻译作为连接外来知识与本土话语的重要中介备受关注,学科翻译史研究视角也备受学界重视。探讨中国现代学科发展脉络,需以知识生成过程为核心重估翻译在学科建构中的历史角色,而面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长期且复杂的学科知识翻译实践,如何建构具备理论解释力与实践适配性的历史分期逻辑,成为当前学科翻译史研究面临的基础性理论问题。

一、学科翻译史分期的三重现实困境

在中国近现代诸多学科从无到有、从边缘发展至体系化的历史进程中,翻译不仅是知识输入的技术手段,更深度参与了学科体系的搭建、研究范式的确立与学术共同体生成的全过程。然而,在对学科知识翻译的历史进行阶段性划分的研究实践中,学界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深层次的挑战。

其一为“起点”模糊与边界不清。学科翻译多肇始于学科建制尚未确立、知识体系尚未明晰的阶段。是时,部分早期译介文本虽已涵盖相关的“学科”概念,但翻译活动的对象、目标与学科归属往往难以明确界定。此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特征使得知识的翻译路径日趋复杂,诸多域外学科知识并非以单线条形式进入中国学术场域,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或通过多种话语形式渗透进来。这种“模糊进入”的状态,使得以学科为

单位的历史划分天然具有不确定性。

其二为史料零散与文献断裂。与制度性学术史不同,学科翻译史往往缺乏完整系统的档案史料支撑。特别是在早期的学科知识引入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知识翻译活动并未正式公开出版,或仅以课堂讲义、私人笔记、口头传授等形式存在,难以证实其实际传播范围与学术影响程度。这种史料层面的空缺,使得部分历史分期无法依托清晰的时间节点或连续的文本序列展开,只能借助碎片化线索进行历史重构,进而提升了研究的主观性与研究结果的分歧风险。

其三为分期逻辑的“史观不自觉”。当前部分研究在开展学科翻译史分期时,往往直接借用政治史、出版史或教育制度变迁史的时间框架,将外在社会事件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核心依据,忽视了翻译自身的知识实践逻辑。这种研究路径往往将学科翻译简化为被动的知识输入过程,忽略了译者的学术主体性、译介策略的多样化以及学术场域结构的动态演变,易使学科翻译史的分期流于行政化叙述,未能真正揭示翻译在学科知识生成与演进中的历史功能。

二、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分期思路

当前学科翻译史的分期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结构”的过度依赖,而忽视了翻译实践中知识生成、规范演化与语境调适的内在过程。唯有反思这一“结构中心”式的认知框架,尝试引入以知识流动与学术生成为核心的“过

程”逻辑,方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更具解释力的学科翻译史分期机制。

聚焦翻译与“学术正当性”的内在关联。域外知识的引进并不必然带来其在本土学术体系中的有效流通与接受,翻译之所以能在某一历史阶段推动学科成长,往往源于其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制度支持、理论承认或范式接纳。因此,与其简单依据年代划分历史阶段,不如围绕翻译何时成为学术正当的“知识生产方式”来设定分期线索。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翻译如何参与学术资本的流通与重组,并在学科建构中发挥其权力性功能。

重视翻译制度的生成与动态变迁。一个显著却常被忽视的事实是,翻译从来不是无结构的零散行为,翻译制度性表征的出现——如学科术语标准的统一、专业译丛的系统建立、学科翻译共同体的形成等——往往预示着学科翻译实践由松散走向系统、由学术边缘走向学科核心。这种制度化的转变,应被视为划分学科翻译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其反映的并非翻译成果数量的简单变化,而是翻译在本土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嵌入程度与融合深度。

引入“翻译—研究—教学”的三位一体逻辑。当学科翻译成果被本土学者系统用于研究工作,并进一步进入高校课程设置与学术训练体系时,翻译就不再是孤立的知识输入过程,而成为本土学科知识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此时,翻译不仅服务于域外知识的阅读与理解,更内化为学科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为线索考察学科翻译史,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某一历史阶段是否完成了从域外知识引介到本土知识吸收的关键跃迁。

倡导多中心、交错型的分期逻辑。不同学科的翻译路径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学科翻译实践经历了持续的阶段性推进,部分学科则呈现出断裂与回流交替的发展格局;即便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理论范式的译介时间也常常并不同步。知识翻译的非线性特征决定了其历史演进不宜以单一时间轴加以归纳。相比标准化、对位式的分期方法,知识社会学视角下“脉络性时段”“关键节点”与“重叠区间”的综合分析,更能体现学科翻译史的复杂性弹性。

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翻译不再是历史节点的附属产物,而被视为一种具有学术能动性、制度创造力与知识重组功能的实践活动。在全球知识格局持续重组、跨语际学术互动愈加频繁的当下,深入探索“知识如何被翻译”“翻译如何生成知识”,不仅是回应中国学术自主性的现实关切,更是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整体跃升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播学翻译史研究”(2025K014)。

以教育家精神筑牢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人才根基

姚平芳 郑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师队伍建设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内在关联。当前,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动力强劲、大有可为的关键上升期,深入探究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养成路径,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对于赋能“三地一区”建设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深远意义。

一、深刻领悟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教育家精神是教师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时代升华。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教育家精神概括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这一精神谱系,既源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也凝聚了党领导教育事业百年发展的智慧。对安徽而言,弘扬教育家精神,就是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国之大者”、情系“省之大计”,把个人理想融入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生动实践。

二、系统探索教育家精神的养成路径

教育家精神的养成,需要个体自觉、制度保障、社会滋养协同发力。唯有从个体出发,经由制度支撑,最终融入社会文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教育家精神的养成,首要在于教师从传授知识的“经师”,成长为引领生命、塑造灵魂的“人师”。《北周书》有言:“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这就要求广大教师须将立德树人作为毕生追求,在教学相长中不断反思、体悟、升华,将教育规律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富有感染力与创造性的教育风格。只有当每一位教师心怀敬畏、躬耕不辍,教育家精神才能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教育家精神的培育,需要坚实的制度支撑,构建有利于教育家精神生长的政策环境。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明确提出“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培育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以及“2027年教育强省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目标。落实这一要求,必须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坚决克服“五唯”积弊,建立以师德、能力和实绩为核心的评价导向。要构建起系统完备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打造从新秀到骨干、从卓越教师到潜在教育家的成长阶梯。要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大硅谷”等高能级平台,推动产学研教深度融合,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凝练思想、形成风格。要

优化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级教师评选、名师工作室建设等政策设计,使其成为涵养教育家精神、孵化卓越人才的有效杠杆。

教育家精神的真正勃发,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滋养。安徽文教渊源深厚,从桐城文派“义法”严谨,到徽州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崇文尚教、尊师重道的基因一直流淌在江淮文化血脉中。当前,安徽锚定目标,聚力建设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改革开放新高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呼唤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从区域发展全局的高度,认识和推进教育家精神的弘扬培育。要大力宣传叶连平、路丙辉等新时代安徽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提升教师职业的荣誉感与吸引力。要推动校园文化革新,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制度环境,赋予教师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更大的自主权,培育开放协作、教学相长的教师专业社群,让教育家精神在自由呼吸的文化土壤中茁壮成长。

三、聚力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安徽实践

教育家精神的养成,最终要落脚于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生动实践。无论是科技创新、乡村振兴,还是文化繁荣、产业升级,最终都依赖于高质量的人才供给,而人才的质量,关键在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就是要引导教师主动对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我省十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攻关上前瞻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基赋能。就是要鼓励教师走出校园、走进田野,用好“科技特派员”“文化辅导员”等机制,以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斩断贫困代际传递。就是要激励教师深挖徽文化底蕴,将古徽州“贾而好儒”的重视教育传统、桐城派“文以载道”的经世思想融入教育教学,在传承创新徽风皖韵中坚定文化自信,讲好安徽故事。

四、结语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安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大力培育和弘扬教育家精神,是一项强基固本、利在长远的战略工程。唯有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唯有政策体系精准引导、持续赋能,唯有全社会真心尊崇、悉心呵护,方能铸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活力充盈的“皖派”卓越教师队伍,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注入源头活水与不竭动能,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新篇章中,展现教育的强大支撑力与独特贡献。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家精神养成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HSKY2024D020)。

作者单位: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驱动力”。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AI)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为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持。同时,“AI+”不仅正在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也在促进人才培养和教育变革方面发挥着巨大潜力。因此,在促进教育领域高质量发展、构建教育强国的进程中,人工智能(AI)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随之变得尤为重要。

一、“AI+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意义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AI)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战略布局中的核心领域,对国家长远发展与国际核心竞争力塑造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2025年教育部发布《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202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一系列专项政策的出台为人工智能(AI)技术落地教育领域、助推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撑。

高等院校作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随着智能时代的快速发展,社会对高素质创新型、智能化人才的需求持续升级,这也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高校应推动人工智能(AI)技术与教育教学体系的深度融合,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对接新时代发展的人才供给需求。

人工智能(AI)技术的赋能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固化、育人形式单一等发展瓶颈,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拓展了发展维度。从教学实践层面来看,人工智能(AI)可实现教学环节的系统化升级,构建智慧育人场景,显著提升教育教学的精细化水平与育人实效,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调配与均衡共享。除此之外,依托智能算法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AI)可为学生提供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助力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育。由此可见,人工智能(AI)正持续推动高等教育的智能化转型,是新质生产力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核心力量。

二、“AI+高等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人才和科技为重要依托,而高等教育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因素,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AI+高等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具有提供人才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价值。具体体现在:“AI+高等教育”打造新质劳动者队伍、丰富新质劳动资料形式、拓展新质劳动对象形态。

首先,“AI+高等教育”针对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探索多元化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打造一大批与现代科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质劳动者队伍。其次,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显著。“AI+高等教育”通过应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新能源、生物制造、智能物联网等产业领域提供了数据库、计算中心和虚拟实验室等数字化生产工具,实现了从传统劳动资料向新质劳动资料的转型。推动劳动资料的迭代与升级,创造具备更高人工智能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丰富并拓展了新质劳动资料的形式。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对象的形态不断得以拓展,不再局限于有形物质对象,数据、知识等都成为新的劳动对象。“AI+高等教育”能够将数据与知识进行融合,对知识体系进行数据处理分析,用大量知识丰富数据系统库存,实现二者的相互赋能,使得知识和数据逐渐成为新质劳动对象。由此,“AI+高等教育”通过影响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劳动者,对新质生产力起到直接赋能的作用。

综上所述,“AI+高等教育”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转型革新的内生动力,同时更是服务国家顶层战略的关键路径。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高等教育应主动对接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推动人工智能(AI)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效能,为新质生产力增长与社会发展筑牢动能支撑与人才根基。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I+高等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张靖莎 徐文婷